

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空巢化”转变及相机选择^{*}

——来自1978—2007年的证据

周靖祥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重庆 400030)

摘要:城市偏向政策分化了中国的城乡,反过来为了消除城乡失衡及城乡差别还得依靠农村的发展壮大。文章分析指出“当前”是相机选择强农村发展道路的关键时刻,同时借助1978—2007年的统计数据进行检查,结果表明:劳动力、资本、土地的产出和收入增长弹性不显著,反过来可以推知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增加有巨大空间;农村劳动力非农化与农业经济增长、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分别存在倒U形和U形关系,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是重要的“相机选择”参照指标。

关键词:空巢化;农村资本;农业经济;农民收入

中图分类号:F061.5;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0)06-0112-11

一、引言

自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是1978年农村改革以来,无可否认,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供求实现由短缺向总量平衡转变,农业生产能力增强,农业科技进步得以提高,农村经济结构转变显著,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条件得以改善。然而近年来农村的空巢化特征开始显现,出现这一不利局面可以简单归因于:工业化、城市化攫取农村劳动力和资本,村庄空心化使教育、文化及社会服务等资源趋于短缺。令人堪忧的现实是出现典型的人口空心化和金融空心化现象,农村的空巢化趋势严峻与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投入不足密切相关。中国城乡不平衡发展的事实证明,政府通过实施城市偏向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实现了农村劳动力和资本的“双重”城市流向,结果却导致农村发展能力被严重削弱,造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城乡失衡严重。进入21世纪,政府虽然已经开始关注农村并已实施一系列有力措施,但是对未来农村发展及农业安全的担忧并未从根本上消除。

中国农村发展离不开人口(尤其是劳动力),且与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对人口集聚的要求并不相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第

收稿日期:2009-12-30

作者简介:周靖祥(1982—),男,云南师宗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

一次,建国初期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进城”,支援城市建设和发展;“精兵简政”措施伴随着城市人口净迁入率下降。第二次(1958—1960年)，“大跃进”运动吸收大量农民涌进城市。第三次,20世纪60年代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结合”运动;第四次,20世纪80年代初,“知青返乡”。第五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限制性的农民工流动。第六次,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上述过程包括了乡—城流动和城—乡及城—城流动三种形式。中国传统社会的“乡土性”明显,费孝通(1998)认为“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由此看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尤其是乡—城)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由于我国农村市场发育迟缓,内生农业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的适时转移就成为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农村劳动力的过度外流与农村资本投入不足,将会成为未来农村发展的桎梏。

政界与学界都意识到了城市化可能带来的好处——中央一号文件锁定城镇化建设道路及凸显和谐城市化的重要性,城乡收入和财富差距的缩小必需依靠城市化(王小鲁、夏小林,1999;陆铭等,2005)。但是,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与和谐、健康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中国在“赶超”目标设置下,发展初期采取的“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发展战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存了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并且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扭曲格局一直未改善。于是一些学者指出城市化扩大了收入差距,那么要缩小差距也只有城市化才是比较好的突破——因为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有城市反哺农村,这样才能达到城乡统筹——推进城市化就是必然的战略选择,用城市化可以解决城乡分配不公的发展难题。但是,当前的事实是,城市化水平较低。据统计,2007年底中国有5.9亿城市人口,城市化率达到45%,但其中包含1.6亿农村人口,在这部分人口中有1.2亿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其他是“县改区”和建制镇范围内的农民。由于统计原因被计算到城市人口中的城区和乡镇的农民以及农民工不能被视为城市人口,这样计算下来真实城市化率只有34%,比统计显示的城市化率低1/4(王建,2010)。

带着诸多疑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既然已经面临严峻形势,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是否将会给农村发展带来“良机”?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何在?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条件有哪些?带着这些问题,以及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被挖空”现状的忧思,本文将在农村经济空巢化分析基础上,以农村经济增长为主线,探讨农村经济发展的源泉动力并求解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出路。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发展农村经济可以带来两大好处:第一,为健康城市化进程中的进城农民积累资本;第二,改变城乡经济发展“二元”格局,快速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二、中国农村发展之殇：“空巢”化趋势严峻

2008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若干意见》指出“探索建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着眼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加快破除城乡二元化体制,努力形成……”。这足以看出农村发展的落后面貌急需改变,城乡发展失衡及扭曲格局需要破除。从某种程度上,农村经济落后的侧面则是农村正在逐渐面临被“挖空”,这种伴随着政策的扭曲式发展轨迹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以下本文将从三方面展开分析。

第一,农业产出比逐年下降趋势明显,由“三分天下”转而成为“十分依靠”,农产品出口比重快速降低。^①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经历了特有的30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改革之初形成的家庭分散经营模式,在初期发挥了农业生产动员的作用和激活农村发展动力的功能,但近年来分散经营的弊端开始显现。十七大指出: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但是,现实是农业生产条件仍然落后(中、西部地区较为典型),农户众多、经营规模小,农业经营方式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发展现代农业最需要解决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就是减少农村人口、降低农业劳动力从业比重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张新光,2008)。结合图1和图2可以看出,农业劳动比重虽然已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60%下降为2007年的40.8%,但是只分享着比重较低的农业产出(2007年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1.2%),劳动份额极低;农产品出口比重由1985年的25.4%下降为2007年的3%,农村经济“外需”拉动面临困难,农产品内需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扭转这一局面可以选择两条路:农业现代化和农业规模化。农业现代化核心是化“农”,农业规模化的本质是化“地”,这是必然的选择。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资本参与利润平均化的规律与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是并行的。中国要战胜农业产出比重下降至10%以下的威胁,上述两条路将会是正确的选择。

第二,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大,非农化速度快;农业工人“工资报酬”水平低,农村农业发展动力不足和城市失业压力同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十分关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算,一般较为公认的数字为4 600—20 000万人之间,学界的估计都是非常保守和谨慎的。王检贵和丁守海(2005)借助新古典模型测算2003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为7.1%,规模为3 460万人左右;并进一步分析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总和才基本与东部地区相当。本文认为前者的估计有很强的说服力。根据200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23亿农村人口计算,农村劳动力大概是4.35亿人,在改革之初却有8亿农民。农村劳动力流动及非农化过程转移

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1983 年农村非农劳动力规模大约为 1 912 万人,2008 年达到 2.34 亿人。影响农村劳动力供需和转移的关键因素是年轻一代务工的选择和决策(高颖,2008),可以推知未来 10 年将是农村劳动力“短缺”的过渡时期;与此同时,城市失业人口规模的扩张也不可避免,不少学者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变动范围的测算是 8%—35%(周晓津,2008);倾向中国总失业率被低估的学者认为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只统计城镇失业情况,并没有包括现在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从种种迹象和现存的大量研究看,随着民工荒的出现,城乡剩余劳动力规模的缩小,以非农业劳动力计算的城乡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接近完成,是否昭示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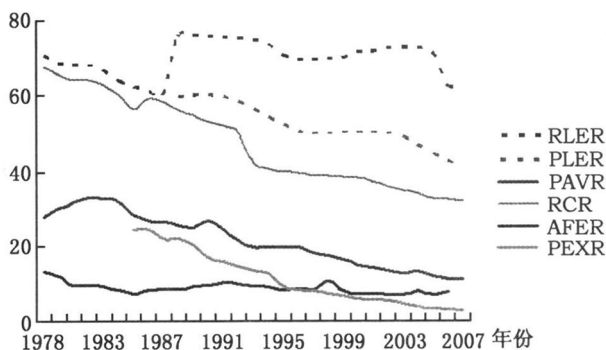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1978—2007 年)^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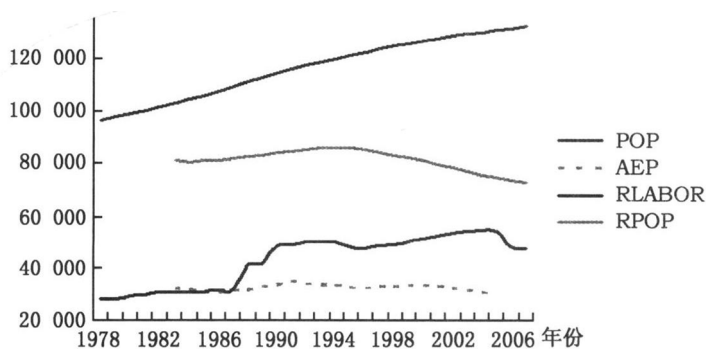


图 2 历年人口和劳动力结构(1978—2007 年)^③

图 1 也显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趋势明显、非农就业比重正在逐步提高的特点。在土地、资本和技术乃至相关制度安排既定条件下,农业产出可视为农业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函数,农业劳动力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一旦与农业发展的劳动力需求结构不相匹配,农业产出下降和农业不安全状况势必会出现。农村劳动力非农化使种植业在短时期内表现出一定的效率(如人均产出增

加),但短期效应的即刻消失不利于种植业结构调整;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种植业难以经受住社会化大市场的冲击,不可能抓住由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具有挑战性的机遇,种植业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不可能出现持续增长(苏小方,2006)。结果,农村农业劳动力短缺将会给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农村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将会面临危机,制约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业产出水平的持续提高;农村土地投入水平降低,土地粗放经营模式难以改变;可能影响和谐农村的建设,甚至阻碍城乡社会协同发展进程的推进。

第三,农村居民消费作为农民分享增长成果和社会福利获取的重要手段,其比重持续下滑,农村发展缺乏活力。1978年农村居民消费占全社会消费的比重为67.6%,2007年下降为32.3%;农村居民消费总体上保持着增长,但增速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村消费比重还会继续下降。从历次经济增长周期看,经济下滑对农村的影响要大于城市,例如农村消费在1989年和2003年曾出现过负增长;居民和政府、城市和农村在消费需求方面的发展不平衡现象使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面临着多重困难:(1)居民消费增速低于政府消费增速;(2)农村消费增速低于城市消费增速。上述问题的描述是对空巢化的担忧,反过来却是改变“三农”面貌的动力所在;这其中对转折时点(或时期)的把握尤为重要,也将是中国城乡和谐社会构建目标是否能实现的重要决定因素。

上述是对农村问题的事实描述和引发的一些思考,承认问题存在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城乡问题的解决目前已经取得巨大突破。丁霄泉(2001)指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的贡献;重新配置从农业部门流出的劳动力,具有一个正的效果,劳动力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使GDP在1979—1998年间增长0.95—1.32个百分点,其中1985—1992年间达到1.38—2.06个百分点。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也落后于城市,据统计,城市民间投资增长速度比农村快2.3—1.3倍左右,^④近年来城市投资增长更是快于农村;可以理解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必然吸引民间资金流向城市,但是非市场力的作用却是城乡失衡问题更趋严峻的关键。增强农村社会自我发展能力所做的各项工作正在加强,农村社会救济费支出呈现出递增趋势,2004年开始实施减免农业税的政策。由农业税税收政策修订引发的地方财政困境以及农村耕地占用的平衡问题,也将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稳定的关键所在。

三、未来的动力源泉:农村资本积累谋农民之福祉

农村经济增长问题一直以来备受关注,但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却改变了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轨迹。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国家围绕工业化目标,选择赶超型发展战略和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通过国民收入的一二次分配政策

实现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和有限资源向工业化的配置和整合。截至 1978 年,国家从农业中汲取的积累大约为 6 000 亿元甚至 8 000 亿元以上(陈锡文, 2005);农业为中国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1978 年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发展出现根本性转变,农村资本积累能力逐渐增强;当然,改革前一系列的“特殊”制度安排,也为改革后城乡经济发展失衡和城乡差距的扩大埋下了“祸根”。鉴于农业的行业特殊性和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一般规律性,资本仍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要素。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PIM)对农村资本存量 K_R 进行估算,借鉴 Griliches(1998)的做法, t 期的农村资本存量用过去所有时期的农村固定资产现值与 $t-1$ 期的资本存量现值之和表示,也即:

$$K_{R,t} = I_{R,t-1} + (1-\delta)K_{R,t-1} \quad (1)$$

其中: K_R 为农村资本存量,分农村集体和农民两部分; I 是固定资产投资, δ 是折旧率,对资本存量的估计涉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折旧率以及 K_0 的确定。本文界定的集体和农户家庭的资本存量数据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农村部门的资本存量,这也是我们为何在此进行资本存量测算时细分的缘故。由于缺乏农村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的统计,并且国家统计局自 1992 年后才有此统计指标,因此这里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替代。折旧率确定依据文献归纳法:王益煊和吴优(2003)得出农村住宅折旧率为 1.5%,机器设备 9%,非住宅建筑 0.9%,役畜产品畜为 11.0%;樊胜根等(2002)和王金田等(2007)对农业资本折旧率的选择都是 4.24%;由于本研究划分过程中发现农村设备购置、役畜和非住宅建筑都没有确切数据,考虑到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对单一性,农村固定资产折旧率设定为 5.25% 和 10% 分别测算。

由此,基期资本存量公式为:

$$K_{R,1978} = I_{1978} / (g + \delta) \quad (2)$$

这里假定 1978—2007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 g 与经济增长率一致,为 9.8%,由于初始资本存量很小,因此估计的整个资本存量时间序列对初始值的选择并不敏感。在此,估计农村居民与集体的资本存量与农业资本存量具有内在的联系,并且其又是可以细分的两部分。在本文估计过程中,1978 年取折旧率为 5.25% 时初始农村居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的资本存量分别为:397 亿元和 121 亿元。通过文献比较发现,农业资本积累速度在逐渐减慢,并且所占比重也在逐年下降,1978 年农业资本积累占总资本积累 20%,1997 年仅为 8.8%。本文的研究结果及变动趋势见图 3。

从纵向年份看,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逐年下降,进一步划分为农村居民个人和农村集体经济两项固定资产投资,1992 年前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高于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且前者增长速度高于后者;1992 年后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低于农村集体单

位固定资产投资额,且前者增长速度也低于后者,这种局面在近几年变得尤其显著。由图3可见,1992年农村居民个人的资本存量增长速度缓慢,1992年资本存量为673亿元(折旧率5.25%,若折旧率为10%,则资本存量为628亿元),1992年后增长速度加快;农村集体经济资本存量一直快速增长,其实在1982年就已超过农村居民资本存量规模,两种测算方法下1992年分别为4569亿元和3067亿元;截至2007年农村居民个人资本存量为2078亿元,农村集体经济资本存量为15016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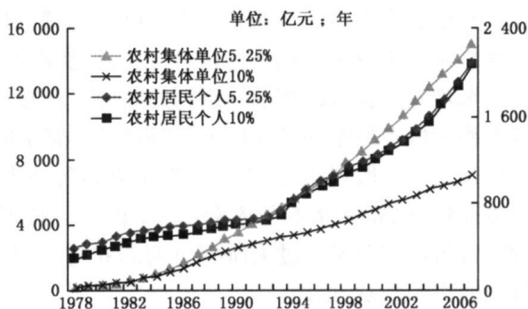


图3 农村资本存量估算结果

农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又是什么呢,在后文中将进行计量检验。至此,我们应该明确的是,农村资本形成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过程,农村经济发展是农业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但是目前的资本积累主要是农村集体经济;农村资本的积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农村资本的非农业化和城市流向不可避免;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还得主要依赖农业,由于资本的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追寻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四、农村经济增长实证检验:农业经济和农民收入视角

(一)计量模型。鉴于前述分析所作的判断,并借鉴已有关于农业生产函数设定的相关研究,设定如下模型:

$$y_t = a + \kappa k_t + \varphi l_t + r \text{land}_t + \lambda_t + \sum_{j=1} \phi_j X_j + \epsilon_t \quad (3)$$

其中: y 、 k 、 l 和 land 表示对应变量的对数形式,分别代表农业产出、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及土地。 κ 、 φ 、 γ 是要素产出弹性, λ_t 是时间效应, ϵ 为随机误差项, X 是其他控制变量, t 代表时间。将其他因素简化,为反映增长变化情况对(3)式进行扩展变形得:

$$\Delta y_t = \kappa \Delta k_t + \varphi \Delta l_t + r \Delta \text{land}_t + \lambda_t \Delta \text{NRlab} + \lambda_t \Delta^2 \text{NRlab} + \Delta \xi_t \quad (4)$$

其中: $\Delta f(\cdot)$ 为增长率, ξ_t 是生产率增长率;应变量改为农民收入 incomeR ,对(4)式的变形还可以用来估计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相应参数的经济含义为“增长弹性”;上方程中加入二次项是为分析临界点,即分析是否存在“转机”。

(二)变量定义。为对(4)式进行估计,引入相关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样本期间为1978—2007年,共计30年。被解释变量有农业产出、农民收入,主要解释变量见表1所示,此外还有 Nat_{fisc} (自然灾害支出)和 Tax_{agr} (农业各税)。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及统计特征

变 量	原指标含义	单位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方差
被解释变量						
Δy_t	农业总产值	亿元	0.177	-0.012	0.064	0.055
$\Delta incomeR$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元	0.409	-0.038	0.162	0.112
解释变量						
Δk_t	农业资本存量	亿元	0.071	-0.529	0.013	0.104
Δl_t	乡村就业人员	万人	0.153	-0.009	0.016	0.104
$\Delta land_t$	耕地面积	万公顷	0.308	-0.020	0.008	0.057
$loan_{arg}P$	农业贷款比重		0.117	0.044	0.081	0.021
$\Delta NRlan$	农村非农业产业从业人员增长率		0.051	0.021	0.049	0.005

（三）数据来源。农业资本存量数据（1978—2005 年）来自王金田等（2007）的估算，本文在此基础上对 2006 年和 2007 年的数据进行回归估算；土地用耕地面积替代，1978—1982 年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其他年份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发展报告 2001 和 2006》、《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年鉴》。农业产出用第一产业产值替代，数据来自《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2008》。其他相关变量的数据收集还参考了《中国金融年鉴 2007》、《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各种定基价格指数来自《中国历年各种价格定基指数统计（1978—2007）》。

（四）结果解释。表 2 为基于前述模型和数据的估计结果。从结果看，产出增长方程中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增长弹性系数都不显著，但农业税变量的影响系数在 1%置信水平下显著，界于 0.215—0.736 之间；当加入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变量后，农业从业人员增长对产出增长的系数由正变为负，统计上仍然不显著。进一步地，加入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二次项进行估计，系数为 -0.112，增长弹性为 0.817。基于统计数据的参数估计结果显示，农业经济增长诸要素在统计上都不具有显著性，但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变量却十分显著。由此可见，农村劳动力非农化速度加快在开始有助于农业经济增长，当达到一定增长速度和“规模”之后将会产生阻碍效应，倒 U 形关系成立，为“转机”选择提供证据。农民收入增长方程中，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主导要素变化对收入的增长效应不显著，与产出相类似，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增长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一次项系数为 0.009，二次项系数为 0.14，U 形关系成立；这意味着农村劳动力非农化速度加快和非农劳动力规模扩张初期有助于农民收入的增长，但达到一定规模或速度后这种增长效应就可能消失，这也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有条件”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了证据，同时也要求进行相机选择。综上发现，找不到任何理由支持要素变化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和增加农民收入，但可以推断农村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有助于农村经济增长。另外，农业贷款比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可能的解释是农

业贷款不足,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尚未发挥。

表 2 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OLS 估计结果

方 程	产出增长方程			收入增长方程	
常数项	0.025 (1.878 [*])	-0.159 (-9.623 ^{***})	-0.136 (-7.952 ^{***})	16.054 (1.958 [*])	15.931 (1.976 [*])
Δk_t	-0.021 (-0.788)	-0.013 (-1.230)	-0.007 (-1.151)	0.134 (0.711)	0.116 (0.638)
Δl_t	0.017 (0.169)	-0.022 (-0.559)	0.036 (1.495)	0.341 (0.508)	
Δland_t	-0.026 (-0.509)	-0.006 (-0.035)	-0.010 (-0.924)	-0.391 (-1.299)	-0.399 (-1.347)
$\text{loan}_{\text{arg}} P$	-0.181 (-1.245)	0.042 (0.711)	-0.132 (-3.163 ^{***})	-2.748 (2.123 ^{**})	-2.627 (-2.099 ^{**})
ΔNRlab		0.315 (11.703 ^{***})	0.837 (7.306 ^{***})	-0.104 (-1.914 [*])	-0.104 (-1.932 [*])
$\Delta^2 \text{NRlab}$			-0.112 (-7.031 ^{***})	0.144 (1.906 [*])	0.143 (1.925 [*])
Nat_{fisc}				0.009 (3.626 ^{***})	0.009 (3.690)
Tax_{agr}	0.626 (17.43 ^{***})	0.215 (11.703 ^{***})	0.736 (7.412 ^{***})		
拟合度	0.923	0.988	0.996	0.421	0.440
D,W 统计量	1.738	1.436	1.970	2.144	2.137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归结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业生产效率使农业能够产生剩余劳动力,随之出现主动或被动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非农产业转移。《中国农业统计摘要 2008》的数据显示,2005 年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达到 2.04 亿人,2007 年增加到 2.37 亿人,并且自 2000 年以来每年递增规模都在 2 000 万人以上,外出农村劳动力占比也在 50% 以上,截至 2007 年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已经达到 40%。以大量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为载体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所带来的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换支撑着中国过去 30 年的农村经济的长期增长,增长的关键是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再配置。但是,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在农村,最大潜力在农业,发展农村、农业经济是可以增加农民收入的,最终目标也应该是缩小城乡二元经济差距、构建和谐社会。李谷成等(2007)将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划分为三个时间段:传统农业阶段、非农产业发展阶段与“反哺”阶段,通过分析指出农业剩余的出现与非农产业的发展是农村经济改革之所以成功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通过上述研究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当非农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须对农业、农村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进行“哺育”,否则就极有可能落入另一个陷阱之中,城市发展能力不足以支撑人口非农化。由于目前我国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城乡二元金融市场、农村土地市场的缺失已成为

制约农业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提高的主要障碍，为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效率提升势必要进行新一轮的农村市场化改革。由此推知，发展农业经济，土地改革和农村资金配置是两大重要手段，这也是进一步保持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并将成为缩小城乡差距、消除城乡失衡的改革切入点。

五、结论及启示

根据全文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农村经济的“空巢化”问题严重，主要表现为农村经济发展活力不足，农村劳动力非农化速度加快，农村消费缺乏收入基础；第二，农村资本的存量积累以集体经济为主导，农村居民个人资本积累不足，任其发展下去将不利于农村、农业经济的平稳发展；第三，在农村经济发展的诸多要素中，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变化的产出和收入增长弹性不显著，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有利于产出增长和农民收入增长，但有附加条件，若转机把握不好即将误入农村经济非增长的陷阱。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的归纳，以及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超前”担忧。本文提出如下思考：一是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城乡融合，最直接的手段还是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二是劳动力是人类社会经济动力，“还富于劳动力”又是目标，因此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需要重视时点的把握和时机的选择，以避免农村、农业发展所需劳动力的短缺；三是要加快发展农村金融，解决农业生产金融资本短缺的问题，同时发展农村信贷消费，激活农村发展潜力；四是要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要求提高土地要素的生产率，并加速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

* 本文是笔者博士论文“中国内外经济失衡研究：理论与实证”的部分内容。感谢责任编辑在修改过程中提供的宝贵修改建议，当然文责自负。感谢“重庆大学笹川良一(SYLFF)基金”的资助。

注释：

- ①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978年的28.1%下降到2007年的11.3%，还会进一步下降。
- ②变量符号含义依次为：RLER(农村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比重)，PLER(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PAVR(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RCR(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重)，AFER(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PEXR(农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 ③变量符号含义依次为：POP(总人口)，AEP(农业劳动力)，RLABOR(乡村劳动力)，RPOP(乡村人口)。
- ④“六五”时期，中国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699.8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8.8%；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1527亿元，占比为19.1%，1992年农村这两项固定资产投资的数值分别为：994.9亿元(12.7%)和1005.5亿元(12.8%)，二者基本持平；但是到2007年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高达14736.2亿元(10.7%)，农村居民固定资产投资5123.3亿元(3.7%)，农村居民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逐渐降低，增速下降。

参考文献:

- [1]周晓,朱农.论人力资本对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J].中国人口科学,2003,(6): 17—24.
- [2]马九杰,崔卫杰,朱信凯.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5,(4): 14—18.
- [3]乔榛,焦方义,李楠.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增长——对1978—2004年中国农业增长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6,(7): 73—82.
- [4]陈锡文.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 [5]王金田,王学真,高峰.全国及分省份农业资本存量K的估算[J].农业技术经济,2007,(4): 64—69.
- [6]樊胜根,张晓波, Sherman Robinson.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J].经济学(季刊),2002,(4): 181—198.
- [7]高颖.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供需变动及分析[J].人口研究,2008,(5): 83—90.
- [8]王检贵,丁守海.中国究竟还有多少农业剩余劳动力[J].中国社会科学,2005,(5): 27—37.

China's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ange of Empty-nest Trend and Corresponding Choice

ZHOU Jing-xi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Abstract: Policies biased in the urban areas' favor divide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im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e have to rely on the rural development.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it is the key time to make the corresponding choice of strong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currently. The empirical results by using statistical data from 1978 to 2007 show that the growth elasticity of output and income of labor, capital and land is not significant, that is to say, there is plenty of room for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s in farmers' income. The relation betwee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featured by inverted U shape and the one betwee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 and increases in farmers' income is featured by U shap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 is a critical reference indicator of corresponding choice.

Key words: empty-nest trend; rural capital; agricultural economy; farmers' income
(责任编辑:许 柏)